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第四辑·第十九卷)

[民国]胡 适
(1891年~1962年)

教育独立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G40
277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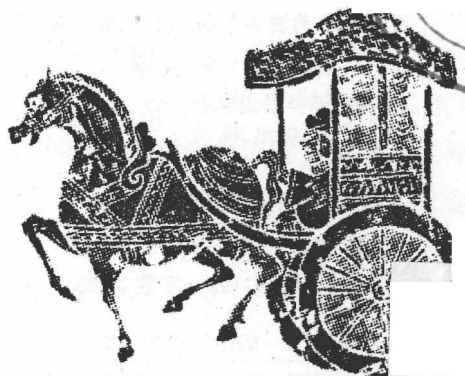
总主编 冯克诚

(第四辑·第十九卷)

[民国]胡 适

(1891年~1962年)

教育独立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0135-740-X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
国文学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9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

[民国]胡适教育独立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80135-740-X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Fax)

E-mail: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四辑·第十九卷

[民国]胡适教育独立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胡适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独立思想主张

- 教育须独立于政党和官府 (1)
- 学术须独立,言论要自由 (4)
- 治学的“独立精神” (6)
- 教会学校不得实施宗教教育 (7)
- 教育独立思潮的历史作用 (9)
 - (一)教育独立思潮的特质 (9)
 - (二)针砭“党化教育” (10)
 - (三)促进了教育与科学事业发展 (11)
 - (四)教育地位与作用认识的提高 (12)

下 篇

胡适教育文论选读

- 敬告中国的女子 (17)
- 论家庭教育 (19)
- 非留学篇(一)(二)(三) (21)

杜威的教育哲学	(44)
实验主义	(54)
论大学学制	(60)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62)
大学开女禁的问题	(65)
新思潮的意义	(67)
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	(74)
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	(81)
提高和普及	(85)
杜威先生与中国	(88)
学生与社会	(90)
中学的国文教学	(95)
《科学与人生观》序	(102)
读 书	(116)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123)
学术救国	(134)
治学的方法与材料	(137)
九年的家乡教育	(147)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160)
为什么读书	(173)
论学潮	(178)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182)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	(186)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189)
再论学生运动	(193)
读经评议	(195)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199)
考试与教育	(203)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209)
教育学生培养兴趣	(216)
治学方法·第一讲:引言	(219)
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	(228)
治学方法·第三讲:方法与材料	(239)

上 篇

现代的教育活动和教育
独立思想主张



教育须独立于政党和官府

胡适(1891—1962)是教育界公认的权威人物,对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建设有重大影响。他毕生所参与的活动极为广泛,绝大部分与教育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担任的职务和头衔,虽前后达100余种之多,但属教育与学术者居其大半。他尽管没有一部系统的教育理论著作传诸后世,但仍可说是对现代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久远影响的教育家。毋庸置疑,他在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学中占居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民国后期,教育界仍对他寄有重望,他继续沿着自由主义路向,提出了教育独立的主张,为教育争得“独立”地位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其活动举其荦荦大端,主要有:1927年6月,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兼秘书;1928年4月,辞光华大学教授,应聘主持上海中国公学;1931年,长北京大学文学院兼中国文学系主任;1946年9月,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1949年5月,避居美国纽约;1958年4月,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职。1962年2月24日溘然谢世。

教育独立是胡适的一贯主张。不过,到民国后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三民主义教育”充斥于整个教育界,独裁专制达到无可复加地步时,使他感觉到要挽救教育,非高擎教育独立大旗警醒世人不可。因而此时他的教育独立愿望更强烈,口号更响亮。

胡适提出教育独立主张,是有客观上、学理上的依据的。

第一,知识遗产的继承性和创造新学术的连续性,决定了教育必须独立于政潮。教育是“接受人类遗产”的必经途径,是积累和传递知识的重要环节,又是创造新学术的重要机关。简而言之,教育是

“增加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源泉。^① 在胡适看来,教育愈是保持其继承性和连续性,其自身的水准便愈高;其水准愈高,便愈是产生与日俱增的独立意识;其独立性愈强,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就愈大。如此良性循环,使教育保持有不间断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第二,高价值的创造必须依赖于独立自由的氛围。胡适认为,唯有教育自身享有相当的独立与自由教育领域内部才有可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生动活泼、民主自由局面。所以,他在《谈谈大学》的讲演中指出:“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之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②

第三,通过历史的考察,证明教育非独立不可。胡适根据中外教育历史的经验,阐明了教育唯有独立,方可对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道理。他说,中国东汉太学教育十分发达,但因太学终为封建官制的一环节,终不免要受各种政潮的干预,常随一姓王朝的覆亡而终止,终逃不脱“人存事举,人亡政息”的命运,这是教育未能独立产生的必然后果,不可能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而欧洲大学与中国太学有同样悠久的历史,更值得重视的是它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独立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③ 正因为不受政党、官府所左右,虽有人事更迭,但学术成果仍不断积累,研究创造层出不穷。历史经验证明:教育必须独立。

教育应如何保有独立地位呢? 胡适认为主要是政府应做出高姿态,说具体一点,只需恪尽职守即到此为止。他主张,政府对教育的唯一职责,便是提供钱、和平及知识分子的自由。诚然,教育与政府不可能如此简单地“井水不犯河水”,但政府对教育的干涉应限制在分拨经费和任免教育、学校行政人员两个方面,不可插手学校内部事

① 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第19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胡适教育文选》,第228—229页,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

③ 《归来之感想》,《晨报》1936年12月5日。

务,不可干涉具体的教育过程。胡适在1932年12月20日与记者的谈话中,较为全面地提出了他对于教育独立于行政的设想:

政府对教育应负之责任,为教育经费之维持,教育人材之选任与撤换。对于教育进行之方针,则应委之教育人员,政府不应过问。乃现政府对教育经费之供给,不但不能用之于扩充教育,虽现状之维持亦有岌岌可危之势。至教育人材之选任,适宜与否,成绩如何,政府尚未加注意。若此而求教育之进展,自难实现。^①

他给政府划分职责范围,实际是指责政府干预具体的教育过多,以致忘却了宽筹教育经费的主要责任,这是政府应引咎自责的。

1937年7月20日,蒋介石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胡适不择时机、不识时务地向蒋介石面陈教育独立的具体主张:

(一)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②

使教育保持独立地位,教育人事极为重要。为此,胡适与南京当局有过多次正面冲突。1928年7月,南京政府解散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具有“独立精神”的胡适等人,为对国民党更为忠诚可靠的孙科、汪精卫等人所替代。美方以中止向该会汇款来实行报复。最后,于1928年底达成国民党的候选人经过理事会的“正式”选举就任代替少数代表位职的妥协。

胡适对这次人事安排的褒奖,颇有微词,认为是政治与教育分离

① 北京《晨报》1932年12月21日。

② 《胡适的日记》第571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的一次胜利,完全满意。^①直到他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请他出任教育部长的信,他仍以不偏任何党派、“洁身自好”的“独立精神”来唐塞与推委。他复函云:

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②

学术须独立,言论要自由

胡适认为,学术是时代的系统思想,直接关涉教育、国家、民族的前途,它是救国的唯一门径。他说:“无论我们要做什么,离掉学术是不行的”,“没有科学,打仗、革命都是不行的”!他举例说:“日本很小的一个国家,现在是世界四大强国之一。这不是偶然来的,是他们一般人都尽量的吸收西洋的科学学术才成功的。”他曾在许多场合不厌其烦地举巴斯德的例子说明这一道理:巴斯德研究化学,攻克了酿酒业、畜牧业和蚕丝业的关键技术,从而使法国崛起。所以,他咬定救国只有“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唯科学可以救国”。

正是基于“学术是国家无形的财富,也是无尽的财富”的认识,胡适认为国家承担着的特别重大的责任,便是发展教育、学术。那

① [美]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5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第208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么,如何才能发展学术呢?胡适认为,政府应少干涉,戒过问,为学术发展提供松宽的文化氛围。

学术需要开展论争,真理尤待辩论而明。当他收到蔡元培请他任大学院职的信时,复函道:

我是爱说老实话的人,先生若放我在会里,必致有争论,必致发生意见,不如及早让我回避,大学院里少一个捣乱分子,添一点圆融和祥之气象,岂非好事?①

在这里他曲尽其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发展学术,还是多几个“捣乱分子”,少一点“圆融和祥之气象”好一些!

实行学术的独立,言论的自由,政府不应人为地划定地域,不允许这不准讨论,那不得研究。他呼吁“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②因而,政府不应以检查制度等关卡压制言论与学术的自由。胡适还坦率直言地谴责南京政府压制言论学术自由的种种企图,并预言如此下去必将失去人心。

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现在国民党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③

在国民党正处于权势的巅峰之时,他却提出了很少有人注意的警告。为形成较宽松的环境,他要求国民党政府应该做到:

“(1)废止一切‘鬼话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国语;(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3)废止一切钳

① 《人权论集·序》,上海新月书店 1931 年版。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447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③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 2 卷第 6 期。

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5)至少至少，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个求直言的诏令！”^①

在斥责教育党化的同时，胡适在呼唤一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时代！

治学的“独立精神”

胡适极其重视治学的方法，就治学的方法问题作了许多次报告，总结众多的治学方法，其实质均贯穿着独立的精神。1932年7月9日，他给北平青年读书互助会讲演治学方法，强调要掌握工具和养成良好的习惯。其良好的习惯包括“不轻信、不迷信”^②的独立精神。

胡适提倡学生应独立地学习，劝诫学生不要过于依赖老师和课堂，尽早丢开拐棍，展翅飞翔。首先，他反对学习受制于升级或毕业的功课与考试，耗费自己全部时光和精力，以致无暇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二，择业切勿受制于社会需要或职业出路，而应充分考虑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其三，努力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入学不必忙于选择系科，不必仓促草率决定，各系的功课都不妨听听，以摸准自己的兴趣到底是什么。他反复告诫学生：

做学问不要去适应社会的需要，不要着眼到将来的职业，不要趋时髦，要看清楚自己宜于做什么，才去学什么。^③

在《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一文中，胡适甚至说，学生如没有起

① 《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第2卷第6期。

② 参见《世界日报》1932年7月10—12日。

③ 北京《晨报》1934年9月15日。

码的独立意识,一味受制于他人与社会,其惨痛的结果可能是:某一行当里的饭桶增多,另一行业里的天才减少,对社会实际上毫无补益。

在与学生谈及尊重兴趣与独立精神时,胡适现身说法,讲自己大学中途改系的经验,并常常以伽利略违背父旨改学数学的经历作为佐证,宣传其“个人兴趣第一”与“尊重独立精神”的原则。

教会学校不得实施宗教教育

与蔡元培“教育独立于宗教”遥相呼应的是,胡适反对教会学校实施宗教教育尤为激烈。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可谓慷慨激昂,颇为精彩。

按胡适的意思,教会学校不应以传教为旨趣,不应从属于传教之需,而应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慈善事业。他从学校的特性上分析说,学校是为社会培养人才之所,决不应将少数人的偏见强加于学校,使学校成为个别人实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工具。他又从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入手,指出既然社会上信教是自由的,那么学校亦应表里如一,切不可强迫学生接受某教教义与信仰。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愤懑地指出:

利用儿童不能自己思想的时期,强迫他做宗教的仪式,劝诱他信仰某种信条,那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右手拿粉笔和教科书,左手拿《马太福音》,也是我们所反对的。教育是为儿童的幸福的,不是为上帝的光荣的。^①

^① 《胡适文存》3集卷9,第1168—1169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这种“诈欺取利”的“不道德行为”，不仅在教育学上违背了培养人才的宗旨，而且在宗教学上也触犯了它自身所反复强调的信仰自由的“天条”与“戒律”。

考虑到当时教会学校在中国数以百计，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数十万大中小学生就读于教会学校的事实，收回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实属不可能，而且即使收回，人力财力物力也难以保证继续开办。所以，他提出了改革教会教育的建设性建议。与此同时，胡适也看到“劝教会学校抛弃传教的目的，比劝张作霖、吴佩孚裁兵还要难的多”的现实，提出了两项建议。

其一是理想的，即要求“教会教育抛弃传教，专办教育”，务须做到：

(一)不强迫做礼拜；(二)不把宗教教育列在课程表里；(三)不劝诱儿童及其父兄信教；(三)不用学校做宣传教义的机关；(五)用人以学问为标准，不限于教徒；(六)教徒弟弟与非教徒弟弟受同等待遇；(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①

其二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既然教会不会放弃其传教布道的目的，那么，最起码的应把学校办成“自由思想”的好学校。他讲了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警告强迫学生信教不可取：“给他自由思想的机会。他若从经验中感觉宗教的需要，从经验里体会得基督教的意义，那种信徒才是真信徒，一个可抵千百个的。”^②

他热切地希望教会办出中国人民欢迎的学校来，真正发挥教会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① 《胡适文存》3集卷9，第1169—117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② 《胡适文存》3集卷9，第1169、116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教育独立思潮的历史作用

(一) 教育独立思潮的特质

物极必反。在重重高压之下虽然会出现短暂蛰伏,但人们心底的愤懑、不满,最终必然或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反映出,而且会使压制者更加头痛。

教育独立思潮在民国后期形成高潮,席卷全社会,涤荡旧有的文化教育设施,正巧暗合着这一朴素的道理。

因此,尽管教育独立思潮中的“弄潮儿”宣布“不谈政治”,但因这一思潮正是政治高压的产物,不谈政治实属不可能的事实。尤其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剧,促使民族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从而使教育独立思潮与“五四”时期及萌生之时表露出某些不同特质。

第一,民国后期的教育独立思潮带有浓厚的、现实的反专制主义色彩。这是国民政府取北洋军阀而代之后,一党专制比军阀统治有过之无不及所决定的。第二,主张抗日的民族主义与反官僚资本色彩。第三,反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反对学生运动。他们反帝反封,但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已成燎原之势的无产阶级革命、学生运动视如洪水猛兽。

正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文化教育和思想学术领域推行一党专制,压制不同言论,迫使知识分子作深刻反省,终于认识到教育与政潮关系过于“火热”,因而甚感教育只有取得独立地位,与政潮保持一定距离,方可依教育的客观规律求生存与发展,不受政潮的蹂躏。

(二) 针砭“党化教育”

1927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提出实行“党化教育”。7月1日,上海各家报刊刊登了由国民党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韦悫起草的《国民政府教育方针草案》;8月,教育行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学校旅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阐释了党化教育的内涵及实施办法:

我们所谓的“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我们有了确定的教育方针,便要把学校的课程重新改组,使与党义不违背又与教育学和科学相符合,并能发扬党义和实施党的政策。我们应赶促审查和编著教科用的图书,使与党义及教育宗旨适合。^①

对于这样的一个只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服务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大不以为然。他指出,党化教育就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治国的手段,实质是一党办教育,为一党的利益而泯灭了群性,教育交由国民党领导人来决定,远不是由教育家办教育;提出党化教育,说明国民党无意于办教育,无意于提高学术水平。

胡适透过党化教育方针的颁布,看到了“革命的国民党变成了专制的国民党”的实质。他沉痛地指出,国民党公布党化教育方针,

目的只是要国民党的自觉。一个在野政客的言论是私人的言论,他的错误是他自身的责任。但一个当国的政党主张便成了一国的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不是私人责任的问题了。

^① 《教育杂志》第18卷,第8号。